

从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生活看农耕与草原文明互动的初兴

李舒涵

(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4.2ka 气候突变事件”之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进入空前繁荣与兴旺阶段。本研究以个案的方式,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发,探讨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互动情况。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变,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公元前2000~前1750年间出现了由粮食生产、猪和狗的饲养、牛和羊的饲养三种主要模式所构成的农牧混合经济。并且,其背后所包含的其实是不同的社会分工、技术与文化背景人群的参与。另一方面,通过对矿料资源的掌控,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建立起了跨地区的贸易交换系统。随着欧亚草原开始出现专门化的畜牧业生产,夏家店下层文化凭借其资源与地理优势,成为公元前两千纪中期长城地带东部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贸易、交换、沟通、交流的主要中介。

【关键词】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业经济;贸易与交换;草原文明;农耕文明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1-0053-11

The Beginning of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ing and Grassland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er-Xiajiadian Culture's Economic Life

LI Shuhan

(Minzu Studies College,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82)

Abstract: After the 4.2ka event, the arch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Great Wall area of northern China entered an unprecedented flourishing stage. In this stud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rassland civilization and farming civilization in the Great Wall region of northern China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wer-Xiajiadian Cultur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patterns in western Liao-river, the mixed economy of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which consisted of grain production, raising pigs and dogs, and raising cattle and sheep around 4.0 ka B.P. to 3.75 ka B.P. Behind the three types of economic patterns, there is a different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people with various techn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rough the control of mineral resources, a cross-regional trade exchang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Lower-Xiajiadian Culture and the surrounding cultures. With the emergence of specialization in animal husbandry in grassland the Lower-Xiajiadian Culture rely on its resources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it became the main intermediary of trad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hange between grassland and farming civilization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Great Wall area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Key words: Lower-Xiajiadian culture; economic patterns; trade and exchange; grassland civilization; farming civilization

[收稿日期] 2022-06-07

[基金项目] 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GIS支持下的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23YBA33)

[作者简介] 李舒涵(1989-),女,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讲师,考古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早期青铜时代考古、科技考古。

中国农耕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的接触、交流、互动,是人类历史走向全球化的大事件,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皆有深远影响。迄今学界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之源起与动力机制的探讨,大多指向气候变迁背景下的人群迁徙与生计方式变化,如认为长城地带畜牧业的兴起及其比重不断增加^①,以及该地带农耕群体与以游战掠夺或远程贸易维生群体之间的共生现象^②。但是,显然还有诸多背景和细节有待厘清。比如,距今四千年前后虽然总体上处于寒冷期,但气候也有波动,此时长城地带诸考古学文化正处于所在地区文化空前繁荣与兴旺的阶段。当时西北之齐家文化,黄河河套地区的石峁、朱开沟文化,以及东北之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所在区域前后时期相比,皆遗址众多,分布密集,出土遗物精彩纷呈。齐家文化实现了西北地区大范围内文化面貌的统一,在其之后,该地区分化出几支不同的文化,且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出现几百年考古上的空白。东北夏家店下层文化更是所在区域首次由生产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考古学文化,同时,它还与石峁类型一样,在交通要道或边界上涌现出大量防御性的堡垒——石城。距今四千年前后长城地带涌现这些共同文化现象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过程?其内在动因何在?这些文化之兴起,对于当时东亚地区草原与农耕文明的起源与演进意味着什么?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下面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发,透过个案的分析,寻求对前述问题更具体、深入和微观的理解。

一、研究背景

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长城地带东段辽西地区,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至前1300年(核心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至前1400年)^③。文化分布区西部为辽西山地,东部为辽河平原,大致以努鲁尔虎山为界,西部为中山、东部为丘陵和平原地貌。在山地、丘陵和平原北部,由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汇流而成的西辽河自西向东流,构成了这一区域的北界,其东部的医巫闾山、南部的燕山山脉构成了这一区域的东、南界(图1)。

辽西区处于生态过渡带,兼具森林与草原两种生态系统,因此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但该区域处于东亚季风边缘带,由于季风年际变化对于气候的影响尤其是降水的影响较大,其生态更为敏感、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则难以恢复。这一区域积温^④、降水均呈现出自北向南、自西向东递增趋势。这种趋势之下,降水幅度的变化更为剧烈,有时甚至会超过100%^⑤。在土壤方面,分布于赤峰市南部、东南部的宁城县至敖汉旗的低山丘陵区以及朝阳市绝大部分地区的褐土带肥力中等,构成了该区域主要的农业区^⑥。综合积温、降水、土壤条件来看,该地区适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区域主要在其东部和南部。

依照自然条件以及文化特征,可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大体分为三个次区,中间以努鲁尔虎山为界,其西北为以赤峰为中心的老哈河流域区(A区),重要遗址有蜘蛛山、药王庙、大山前、上机房营子、三座店、四分地东山咀、二道井子等;其东南即大、小凌河流域区(B区),重要遗址有丰下、水泉、罗锅地、康

① 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燕京学报》2003年第14期。

② 郭静云:《从石峁遗址谈“共生”社会的形成》,《中国文物报》2015年9-25;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1-275页。

③ Xin Jia, Shuangwen Yi, Yonggang Sun,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prehistoric human settlement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Xar Moron River, Northeastern China*. *Frontiers of Earth Science* January 2017, 11(1) 137-147;田广林:《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燕北类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④ “积温”指某一区域气温 $\geq 10^{\circ}\text{C}$ 持续期日平均气温总和,是考察农作物生长的主要热量指标。

⑤ 吉迪:《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4-75页。

⑥ 赤峰市土壤普查办公室编:《赤峰市土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200页;贾文锦编:《辽宁土壤》,辽宁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闫洪亮:《朝阳县土壤类型分布特征及特点研究》,《现代农业》2019年第2期。

家屯、向阳岭、城子山(三官甸子)等;其东北部为孟克河和教来河流域区(C区),重要遗址有大甸子、范仗子、乃林皋等(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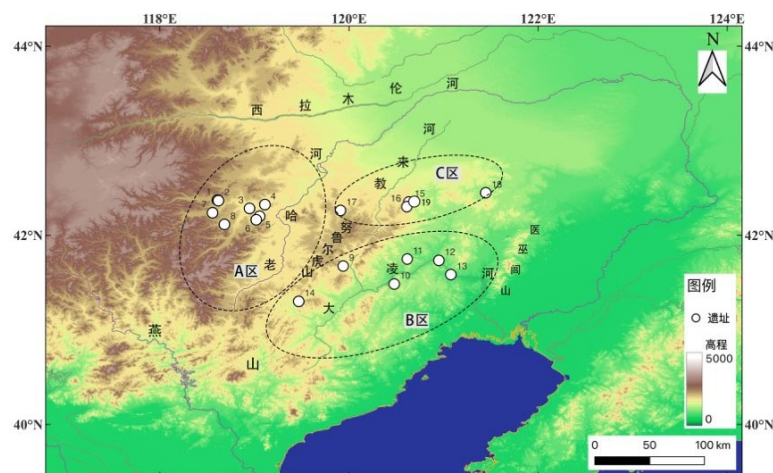


图1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空间及本研究主要涉及遗址

(A区:1.上机房营子2.三座店3.蜘蛛山4.夏家店5.二道井子6.药王庙7.四分地东山咀8.大山前;B区:9.水泉10.罗锅地11.丰下12.康家屯13.向阳岭14.城子山(三官甸子);C区:15.范仗子16.大甸子17.乃林皋18.界力花19.兴隆沟第三地点)

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前,该地区还曾相继出现过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与小河沿文化等。以往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来源、文化属性及社会发展动力时,多从遗物或遗迹现象入手,较少涉及到经济与技术等层面。但很显然,经济生活才是形塑社会文化形态、理解其特征与发展动力的关键基础。纵观辽西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整个发展历程,正是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之时,该地区的粮食生产和畜养经济才突然有了重大发展,手工业与商业贸易亦初步兴盛起来。这些重大变化显示,与此前时代相比,当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属性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数千年少变的狩猎采集定居文化

虽然在兴隆洼文化早期辽西地区就初步萌生了粮食生产和动物畜养经济,但对于该地区何时过渡到以生产型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认识却大相径庭。由于证据和切入角度不同,学界形成了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三种代表性观点。端看其使用何种证据并从何种角度切入:认为赵宝沟文化的主导经济为农业生产,且发展出了成熟的耜耕农业者,主要依该文化所出石器工具等间接证据来判断^①;声称红山文化以农业为主导经济形态者,主要依据的也是聚落环境、数量、面积等间接证据^②;唯有主张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方才进入农业社会者,才主要依据当时动植物遗存出土情况等直接证据,以及聚落环境、规模等间接证据^③。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赵宝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刘晋祥、董新林:《浅论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经济》,《考古》1996年第2期。

② 刘国祥:《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年。

③ 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中国农史》2020年第3期;贾鑫、孙永刚、杨金刚等:《西辽河上游地区夏家店文化时期浮选结果与分析》,《农业考古》2017年第6期;李水城:《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年刊)。

近年对双肩石锄、石铲、磨盘和磨棒等以往被认定为农业生产工具的石器进行实验考古、微痕分析、淀粉粒分析,结果表明它们并非农业生产工具,而很可能与狩猎采集经济下的定居生活及食物加工有关^①。这意味着所谓赵宝沟文化已进入农业社会的说法不能成立。事实上,赵宝沟文化的遗址内发现的农作物遗存的数量极少但野生动物骨骼数量较多。虽然赵宝沟遗址发现的猪骨从死亡年龄上不排除家养可能性,但其形态仍与野猪类似^②。这些都表明,赵宝沟文化人群可能有初步而少量的农业生产,但狩猎采集依然是当时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

虽然红山文化以发达的玉器文化以及大型积石塚和祭坛等遗存闻名,给人一种社会文化发达的印象。但令人困惑的是,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植物遗存依然较少,迄今仅在兴隆沟第二地点^③、魏家窝铺^④等遗址浮选发现了少量粟、黍遗存;家养动物骨骼亦少见,但野生动物骨骼发现较多;其石制品中与狩猎相关者仍占有较大比重,磨制石器数量有所减少。总体来看,红山文化的农业经济并不发达。

除上述文化之外,辽西地区的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所发现的遗址不多,动、植物遗存的发现和研究较少。根据目前的研究,富河文化可能存在比较原始的粮食生产,但主导经济为渔猎^⑤。小河沿文化时期人口规模缩小,主要的经济模式还是以狩猎采集为主而兼有少量农业生产^⑥。

很显然,关于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为农业社会的说法皆证据薄弱,较难成立。实际上,在夏家店下层之前辽西地区的主要经济与社会形态是“定居(半定居)的狩猎采集”:即这些人群充分利用周边的环境资源,并种植少量的黍、粟等农作物作为狩猎采集经济的补充,从而可以在一定时期定居于一处。他们与完全游动的狩猎者不同,也与完全定居的农耕族群不同,他们建造了聚落,但可能还保持着有限空间范围的游动性以维持狩猎经济。其社会文化也显示出与此种生活方式的相关性,如出现在陶器、玉器上的野生动物主题纹饰等。

但令人困惑的是,一般认为狩猎采集社会由于食物产出量低,难以养活众多人口,所以狩猎采集群体的一般规模为50~100人^⑦。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规模往往较大,特别是兴隆洼文化时期,一个聚落内的房址数量往往有数十座,人口规模有数百人。该地区何以能够提供足够的狩猎采集资源,让大规模人群进行定居生活?冈村秀典引用民族志资料,认为辽西流域新石器时代狩猎采集民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加上食物贮藏技术而过着丰裕的定居(半定居)生活,并发展出丰富的精神生活^⑧。来自魏家窝铺遗址的证据也支撑了这种说法:从面积和房址数量来看,该遗址是红山文化时期较大的定居聚落,但其动植物遗存反映出渔猎为主、少量粮食生产的经济模式^⑨。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分布在森林与草地的交错地带,环境中存在丰富的食物资源,可以为狩

① 王小庆:《石器使用痕迹显微观察的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07-151页;刘莉:《中国史前的研磨石器、坚果采集、定居及农业起源》,《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05-132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赵宝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78-201页。

③ 袁宇倩、孙永刚:《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述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88-199页。

④ 孙永刚、曹建恩、井中伟等:《魏家窝铺遗址2009年度植物浮选结果分析》,《北方文物》2012年第1期;孙永刚、赵志军:《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综合研究》,《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

⑤ 滕海键:《也论富河文化经济形态》,《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⑥ 孙永刚:《西辽河上游地区与中原地区史前生业方式比较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⑦ 弗拉基米尔·卡博著:《食物生产经济的起源》,黄其煦译,《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

⑧ 冈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71-206页。

⑨ 孙永刚、赵志军:《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综合研究》,《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

猎采集提供多样化资源,亦为定居(半定居)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总之,较低的人口密度,丰裕的食物资源、觅食能力提高、具备各种食物加工与储存技术,少量食物生产经济所起到的补充作用,使得辽西地区这些人群可以长久保持定居(半定居)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该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四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流行之字纹直腹平底罐等采集储存陶器,打制的双肩石斧、石铲等工具,以及方形半地穴式房屋等,可谓数千年不变或少变。

三、粮食生产与畜养经济的勃兴

众多证据表明,辽西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经济形态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生产和家畜饲养上升成为当时最主要经济形态。具体表现在: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农作物种子,以年代早晚来看:建平水泉遗址(B区,图1:9)⑤层下的3座窖穴中即发现了大量炭化农作物种子^①,其底部有约0.8米厚的炭化谷粒,估算储粮超过两万斤^②;丰下遗址(B区,图1:11)也发现了“成堆”的炭化粟和黍^③;四分地东山咀(A区,图1:7)的一个甗鬲部(H5:1)发现储藏已脱壳的粮食种子^④;大山前第I地点(A区,图1:8)“灰坑”和房址内也发现了少量粮食种子^⑤;大甸子、乃林皋(C区,图1:16、17),城子山(B区,图1:14)等遗址浮选发现了少量的炭化粟、黍种子^⑥;二道井子、三座店(A区,图1:5、2),兴隆沟第三地点(C区,图1:19)等遗址均发现数万粒炭化农作物种子^⑦。

与此相应的是,遗址中野生动物骨骼的数量大幅减少,家畜动物骨骼在遗址中的占比远远超过野生动物。比如,若以动物骨骼所反映的最小个体数计算,水泉遗址出土的家养动物占79.5%,野生动物占20.5%^⑧;大山前第一地点出土的家养动物占98.53%^⑨;大甸子遗址中亦以家养动物为主,野生动物仅发现了少量鹿科动物骨骼^⑩。

观察夏家店下层文化各遗址的经济内涵,在空间上具有以下规律:

- ① 遗址T15⑤的测年结果经校正为2200-1930 cal BC,推测粮食窖穴的年代与之接近。
- ② 何贤武:《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 ③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3期。
- ④ 辽宁省博物馆等:《内蒙古赤峰县四分地东山咀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
- ⑤ 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边疆考古研究》2007年(年刊)。
- ⑥ 贾鑫、孙永刚、杨金钢等:《西辽河上游地区夏家店文化时期浮选结果与分析》,《农业考古》2017年第6期;吉平、金锐、崔笑宇等:《内蒙古敖汉旗乃林皋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6期;赵克良、李小强、尚雪等:《青铜时代中晚期辽西地区农业活动特征》,《植物学报》2009年第6期。
- ⑦ 孙永刚、赵志军、曹建恩等:《内蒙古二道井子遗址2009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赵志军:《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特点》,《科技考古》(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45页;孙永刚:《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业方式——以植物考古学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5期。
- ⑧ 数据来自:师宏伟、贾鑫、王闯:《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动物考古研究——兼论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动物资源的利用策略》,《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1期。数据中的“野生动物”以低肉量提供的东北盼鼠为主,实际上该遗址的动物资源利用以家养动物占绝对比重。此外,张镇洪的相关统计(《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为:家养动物占94.2%,野生动物占3.6%,但该数据包含了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等不同时期。
- ⑨ 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边疆考古研究》2007年(年刊)。
- ⑩ 罗运兵:《大甸子遗址中猪的饲养与仪式使用》,《边疆考古研究》2009年(年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首先,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工特征。分布于西北部的老哈河及其支流的遗址(A区),动物饲养经济较为发达,粮食生产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后期(公元前1750年之后)才开始扩大发展。分布于东北部教来河流域区的遗址(C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十分发达的动物饲养和粮食生产经济。分布于东南区凌河流域的遗址(B区)是辽西地区最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不仅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发展粮食生产经济的区域,其动物饲养经济也一直较为发达。

其次,在同一区域内部,大体可依遗址所在地形分为台地型、坡岗型和高山型^①,其经济形态又各自有差。以粮食遗存的出土情况为例,台地型遗址发现粮食遗存的概率最高(水泉、丰下、大山前I地点、二道井子、大甸子、点将台、香炉山、平房等遗址),其次为坡岗型遗址(四分地东山咀、乃林皋、三座店、兴隆沟第三地点等)。高山型遗址一般地层堆积较薄,多包含石围墙或壕沟,常常沿着河流呈线性分布,非常注重防御性。这些特点说明高山型遗址的性质与普通聚落不同,加之此类遗址中亦较少发现粮食遗存,推测其很可能并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韩茂莉统计了敖汉旗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聚落选址与地貌比例,发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位于坡岗的遗址比例下降,而位于山顶和台地的遗址比例上升^②。结合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生业经济模式的变化来看,当时人群向台地迁居的主要肇因应该就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化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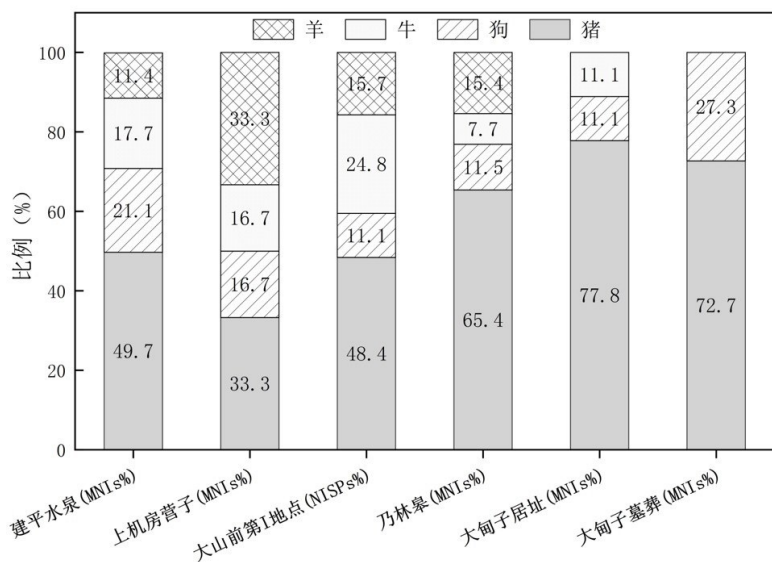


图2 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猪、狗、牛、羊”四种家畜比例

实际上,已经有学者从陶器变化关系的角度论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除承袭本地红山、小河沿文化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文化变迁与后岗二期人群的迁入有关^③。粮食生产技术的变化应该也与此有关。这些来自旱作农业腹心地带的的人群或许就是导致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粮食生产技术突然提高的直接原因。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动物饲养经济十分发达,猪、狗、牛、羊^④四类家畜在遗址中普遍出现。猪骨的出土数量通常最多,在不同遗址中出土比例的变化范围在33.3%至77.8%之间(图2)。大甸子墓地中的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② 韩茂莉:《史前时期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研究》,《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

③ 王立新、卜箕大:《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源流及与其他文化关系的再认识》,《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79-187页。

④ 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羊包括山羊和绵羊,但是否同时出现以及具体情况暂时不详。

大量埋牲现象,反映出当时饲养猪、狗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虽然家猪和狗的饲养在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以来一直存在,但一直只是狩猎经济的补充,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家猪饲养才成为主要的肉食来源。这一变化的原因应该与主导的生业经济模式转换有关:粮食生产技术的提高和规模增加,进一步提高了定居的稳定性,使得饲养家猪的规模得以扩大。而饲养狗则可能存在多种目的:张镇洪认为当时可能存在食狗肉的风俗^①;王明珂认为狗的用途可能是为了放养猪在野外觅食过程中驱赶猪群^②;此外,对于狩猎、畜牧、游牧经济而言,狗亦是助手。

与家猪和狗不同,辽西地区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才普遍饲养牛和羊。就出土情况来看,上述五个遗址中有四个遗址出现了羊骨,不同遗址中出土比例在11.4%至33.3%之间;牛骨在四个遗址中均有发现,出土比例介于7.7%~24.8%之间(图2)。牛和羊是畜牧或游牧经济中主要的畜产构成,羊的产乳量和繁殖率高,适应性和移动性最好,是游牧经济最主要的畜养动物;牛提供的肉食量和产乳量较高,但移动性较差,在畜产构成中比例往往较羊低。不过,其比例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冬季牧场雪多的地方,或水源匮乏的地方,不适宜牛的生存,此类环境中牛的占比往往较低;而过于潮湿的地方,易使羊生病,因而羊在畜产中占比往往会降低。此外,羊在饲养过程中需要大范围移动以获取食物,因此最不与农业兼容,牛则可以与农业、狩猎等经济模式共存^③。

有学者注意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区的西部羊的饲养经济更为发达^④。如从西部的上机房营子和大山前遗址(均为A区)动物遗存的出土情况来看,相较于其它遗址,猪骨的出土比例有所下降,而牛和羊的出土比例上升。尤其是在上机房营子石城,猪的最小个体数(MNIs)比例与羊一样,并且牛的肉食贡献率高于猪(图2)^⑤。就目前的发现来看,在老哈河流域(A区),羊和牛的饲养经济更为发达;而在大凌河、教来河流域(B区和C区)则是猪占饲养经济的主体。

在教来河流域大甸子遗址中(图1:16,C区),羊不见于居址和墓葬,说明该遗址的人群并未畜养羊,这与同时期其它遗址不同。此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有关。大甸子遗址存续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气候较好的阶段,遗址周围分布森林、农田、草原和沼泽^⑥,潮湿的气候环境很可能使得当时人群放弃了饲养羊。此外,牛仅见于居址而未用于墓葬殉牲,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大甸子墓地的葬制十分明确,随葬品根据墓葬分区、等级、性别存在明显的区分。随葬的牺牲也应该经过有意识的选择,即,在墓地中出现的大量猪、狗,而不见居址中已经出现的牛,很可能是当时人群有意识选择的结果。

更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和粮食生产技术的提高促进了猪的饲养规模,但牛和羊的畜养则发端于不同的经济模式。在欧亚草原畜牧业发展与传播背景下,在公元前2500至前2000年之间,牛和羊开始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以及黄河流域出现。而其出现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可以从不同的层面理解:从技术层面来看,这两类动物的饲养与辽西地区传统猪和狗的饲养不同,其均需要放牧饲养,并且饲养羊与农业生产的兼容性差,因此在初期只有掌握了专门畜养技术和知识的人群才具备这两类家畜的饲养能力;而从生产的社会分工来看,牛和羊的饲养、猪和狗的饲养、粮食生产所代表的是三种不同的社会分工。

林沄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之间存在联系,并认为“喇叭

① 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4-106页。

③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20页。

④ 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燕京学报》2003年第14期;师宏伟、贾鑫、王闯:《辽宁省建平县水泉遗址动物考古研究——兼论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长城沿线地区动物资源的利用策略》,《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1期。

⑤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赤峰上机房营子与西梁》,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9-252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3-333页。

口耳环”源自安德罗诺沃文化^①。进一步看,“喇叭口耳环”的出现(特别是出自墓葬、佩戴于墓主人身上)应该代表一群直接或间接受到相关文化影响人群的出现。伴随着畜牧业的传播与发展,以及马匹的驯化,畜牧经济中进一步分化出了游牧经济^②和掠夺经济:公元前两千纪之前,农耕文明中城市化的出现、青铜技术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以及贸易的需求,对游牧族群的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③。大约在公元前两千纪,马车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掠夺人群的战争技术,使其成为专事游战的族群^④。此后,欧亚大陆形成了东西方向(游牧经济之间),以及南北方向(游牧经济与农耕文明之间)广泛的互动与交往活动。此种交往活动中,位于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即与“农业地区接壤的大前沿地带”成为了最早的农牧文明进行军事及技术、思想、贸易接触的地区^⑤。辽西地区便属于这样的“前沿地带”。这一区域最早开始发展牛、羊畜牧经济的,可能就是从草原南迁的人群。这些人群已经掌握了相关的畜牧知识和技术,可以在新的环境中较快开始发展动物饲养经济。与此同时,这些人群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更易于保持与草原族群的互动。

值得一提的是,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显示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众体类型的多样性。大甸子墓地大体存在两群众体特征有差异的人群,第一类型(第一组)最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第二类型(第二、三组)体质特征总体接近东亚蒙古人种,但存在部分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两种类型存在明显的体质差异。前者可能与中原地区居民有较亲近关系,而后者可能与长城地带及东北地区的前期居民相关联^⑥。

总体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主要的生业经济形态是由粮食生产、猪和狗的饲养、牛和羊的饲养等构成的农牧混合经济,三类不同的经济背后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分工乃至不同技术、文化背景的人群。在全球性气候事件末期,不同生业方式、文化背景的人群开始向辽西地区开始“移民”,导致了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因此,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理解需要从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碰撞、交流及互动的视角中去观察。

四、跨地区贸易交换系统

公元前两千纪之前,畜牧业已经在欧亚草原大规模发展,从南部传播过来的农业技术也在环境适宜地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欧亚草原人群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的混合经济模式。“4.2ka 气候突变事件”发生之后,欧亚草原大部分地区开始变冷、变干,使得一部分人群逐渐放弃了混合经济中的农业而专注发展畜牧业,为之后的“专业化游牧”奠定了基础。

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方式,也意味着草原人群对南方农耕族群的依赖性开始增加。通过贸易、交换甚至掠夺获取资源以及手工业制品成为了亟需,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草原人群与南部农耕区人群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就目前中国的考古资料而言,在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这种互动和交流主要通过中间人群实现。基本上在公元前两千纪前后,中国北方长城沿线的朱开沟、石峁、夏家店下层等数个考古学文化的兴起,均与欧亚草原牧业及游战生活方式的出现有关。

① 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燕京学报》2003年第14期;林沄:《夏代的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年刊)。

② 有一些学者认为游牧经济发轫于公元前一千纪,但从马匹驯化和马车出现的时间来看(公元前两千纪),与之关系密切的游牧经济诞生的年代应该要更早。

③ 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页。

④ 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6-217页。

⑤ 杨建华:《国外关于欧亚草原史前时代晚期的综合研究评介》,《边疆考古研究》2014年第2期。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4-262页;张全超、郭林:《辽宁阜新县界力花遗址出土人骨研究》,《考古》2014年第6期。

从交流的传统来看,早在富河、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就存在与贝加尔湖周围以及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的交流^①。这些文化交流活动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出现的组织化的贸易群体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地理传统。

辽西地区拥有较丰富的铜、锡矿资源。红山文化时出现了范铸技术^②。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对西拉木伦河以北、大兴安岭南麓的大型铜、锡矿床进行了开采^③。对于周邻文化而言,夏家店下层文化在矿料资源和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使其得以向大坨头、朱开沟文化输出铜料资源^④。现有资料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鄂尔多斯高原朱开沟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直接接触”,但是张家口及燕山南部大坨头文化在二者之间所起到的“中间作用”亦同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文化在贸易过程中很可能存在“竞争”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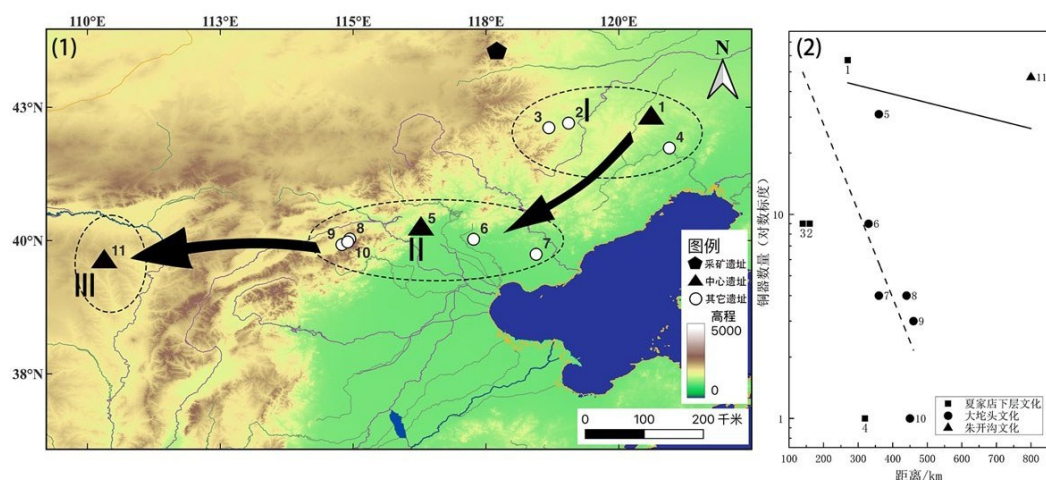


图3 (1)铜料交换示意图(2)铜器数量递减分布

(I 夏家店下层文化 II 大坨头文化 III 朱开沟文化相关遗址:1.大甸子2.二道井子3.大山前4.康家屯5.张营6.张家园7.唐山古冶8-10.壶流河流域遗址:庄窠、三关、前堡;11.朱开沟)

当时的交换与贸易情况,可以使用递减分析模型来说明,见图3。该模型的原理是贸易品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可以通过考察数量与距离之间的关系来观察贸易品分布的规律。虽然当时交换的主要是铜料,而此处统计的是铜器,但由于铜料是铜器的直接原料,因此该模型也大体适用。在夏家店下层、大坨头、朱开沟文化中,铜器数量随着距西拉木伦河以北矿区距离增加而出现下降趋势。并且在每个文化分布范围内均存在一个遗址,出土铜器的数量远远多于其它遗址: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

- ① 冯恩学:《我国东北与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三个问题》,《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吕昕娱:《试析红山文化玉器的材质》,《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郭静云:《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第151页;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1-153页。
- ② 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红山文化西台类型遗址简述》,《北方文物》2010年第3期;林秀贞、杨虎:《红山文化西台类型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集刊》2013年。
- ③ 李延祥、席光兰、李辰元等:《辽西青铜时代早期矿冶遗址考察报告》,《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 ④ 李秀辉、韩汝珍:《朱开沟遗址出土铜器的金相学研究》,《面向21世纪的科技进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下册),1999年;陈坤龙、王璐、王颖琛等:《河北蔚县出土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文物》2017年第6期;崔剑锋、郭京宁、郁金城等:《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出土青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古代文明》(辑刊)2008年,第212-222页。

为大甸子遗址(图3:1),出土铜器57件;大坨头文化中为张营遗址(图3:5),出土铜器31件;朱开沟文化中为朱开沟遗址(图3:11),出土铜器43件。这些地点在某种程度上均可视为与参与铜器再分配的“中心地点”(三个地点在公元前1700至前1400年之间,具有共时性)。

在铜料交换系统中,“中心地点”对于铜料资源的占有程度非常高,意味着交换资源由少数群体掌握。这对于理解当时的交换模式十分重要,即在交换关系处于主导的人群是那些少数、对资源占有程度较高的人群。当然,这属于交换系统的主要模式而非唯一模式:大坨头文化的古冶、张家园等遗址中也能见到铸铜工具——范,说明这些遗址也存在小规模铜器生产,只是较于张营遗址规模要小得多。即除了“中心地点”之外,其余生产地点虽然也可以获得铜料资源,但获取的数量要少得多,因此才未形成大规模生产。

贸易代表了物资的双向流动。除了铜料资源之外,当时其它的交换类别暂时难以了解,不过从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爵、鬯等器物 and 可能产自中国南方的漆器,以及大山前、水泉、乃林皋等遗址所发现的少量家马骨骼来看,物资类别和涉及区域可能相当广泛。张光直曾列举了商代可以进行贸易的资源:农产、有特殊用途的动物、手工业品、贵重物品、奴隶(战俘)等^①。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交换资源应该涵盖在上述范围内。目前来看,人群的多元化与对不同地域资源的协调能力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组织化的基础。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草原对于农耕地区物质资源的需求更甚,因此更易产生“贸易逆差”。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的防御性建筑和军事化特征就表明掠夺贸易品的情况很可能普遍存在。最明显的证据是,具有较高防御性带有“马面”的石城主要分布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北界即英金河及其上游的阴河流域^②,以及东南部边界即大凌河南岸、小凌河流域^③。由这些防御等级高、防御设施严密的石城址分布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中的紧张关系更多来自社会外部,此类石城的修筑应主要出于保护贸易物品和贸易路线的目的^④。

综合来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粮食生产促进了猪和狗饲养业的发展,而畜养牛和羊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分工与技术人群的存在。但是,使其社会多元化、组织化的更主要原因是与贸易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可以视为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文明体系。这种文明体系之所以出现在辽西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不同区域人口迁入的阻力较小。辽西地区原本为定居的狩猎采集文明,在红山文化时发展到极盛之后开始迅速衰落,人口随之减少。因此,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之时,不同区域、生计方式的人群迁入,不论是生存空间还是与当地文化融入方面,所遇到的阻力均较小。

其次,具有广泛交流的文化和地理交流的传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辽西地区与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及贝加尔湖周围区域的广大地区存在交流与交换活动。这种交流现象极有可能已经融入了不同族群的记忆与认识当中,当这些人群开始寻找资源交换契机时,便开始在辽西地区出现。

第三,具备资源与地理优势。辽西地区具有铜、锡矿资源的优势,通过掌握并控制矿料资源,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与周边其它文化进行矿料贸易与交换。由于地处农耕与草原区的接触地带,该文化中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群又为不同区域间的贸易与交换等互动提供了便利。

最后,不同区域人群对资源交换的需求日益强烈。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由于气候环境变化,欧亚草原上部分人群放弃了混合经济中的粮食生产而专注发展畜牧业,由此对农耕地区的资源和手工业产品产生出强烈需求。而彼时的中国已经是古国林立时代,社会分化加剧,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统治阶层对于贵重物品的需求逐渐增强。由此,作为贸易纽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开始出现。

①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70-383页。

② 位于阴河、英金河流域带有“马面”的石城主要呈线性分布,如尹家店、迟家营子、西梁、上机房营子、三座店、西山根、新店、大榆树底、赤峰市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等。

③ 位于大、小凌河流域带有“马面”的石城主要有康家屯、大刘台山石城等。

④ 郭立新、郭静云:《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三)》,《南方文物》2022年第3期。

结 语

通过上述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经济生活的观察,可以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在文化初始阶段(公元前2200至前2000年),少量掌握着旱作农业技术的人群来到辽西地区,与当地入结群,在一些适合农耕的小区域(如B区大凌河流域区),开始粮食生产和家畜饲养(以猪为主)。第二阶段在公元前2000至前1750年之间,随着粮食生产与家畜饲养技术的进一步强化,更多的定居点被开拓,气候变化以及区域内西北与东南环境的差异,导致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的自然分工,西北部(A区)以发展畜牧业为主(羊和牛的饲养开始在这一时期普及),东南部大凌河流域(B区)粮食生产、饲养猪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模式。第三阶段(公元前1750至前1300年)早期伴随气候重回温润,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出现更加繁荣景象。这一阶段的生产经济中粮食生产和家畜饲养变得更为发达,特别是大甸子墓地出现了目前国内同时期遗址中所见数量最多的殉牲现象,反映出家畜饲养业极为发达;约从公元前1400年开始,夏家店下层文化逐渐衰落。此时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冷,在气候影响下,粮食生产,以及在粮食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猪饲养经济开始衰落。

伴随着生产经济的发展,约在第二阶段末期,大凌河流域(B区)出现的牛河梁炼铜遗址群说明冶金生产已经步入专门化^①。而在大凌河南岸出现的罗锅地环壕、康家屯、向阳岭石城等遗址内发现了大坨头、朱开沟等多个外来文化因素。这些分布于凌河两岸交通要津处的环壕、石城似乎就是最早的贸易据点,并且凭借这种优势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小型的地方性政权。该阶段凭借冶金与贸易等经济手段也为下一阶段文化、经济繁盛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发现的外来文化因素器物及体质人类学证据表明当时存在不同文化背景人群与当地人群之间共处一处、互有融合的现象。此阶段的贸易活动非常活跃,除了与周边区域所进行的贸易之外,还发展出了远程贸易。贸易物品很可能已经不局限于冶金制品,而是扩展到农耕区与草原区之间的互相需求的其它货物种类。作为保护贸易的设施,在关隘或交通要道上的石城址大量出现。特别是在边界区出现的占据地势险要之处、附属大量防御设施的石城,表明当时的紧张关系多来自社会外部,其出现原因很可能出于对贸易物品和路线的保护。此阶段末,随着对大兴安岭南麓矿区逐渐失去控制,贸易活动也日渐失去活力。此时期,随着燕山南部新商道的开通,草原与南部农耕区域之间交流的重心开始南移。

总体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外来人口的迁徙使得当地粮食生产技术取得突破式发展,由此使得饲养猪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还出现了专门畜养牛与羊的人群,其畜养技术和知识可能受到草原畜牧业的影响。从社会内部来看,粮食生产与猪的饲养,以及牛、羊的畜养属于不同的社会分工,多种经济技术的出现是构成夏家店下层文化多元而复杂面貌的原因之一。但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并非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文明,而是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贸易文明体系。人群的组织化、军事化,以及防御性石城的建造,均与贸易有关。从其兴盛的最主要原因来看,与欧亚草原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对南部地区资源和手工业产品需求,以及农耕文明中统治阶层对于贵重物品的需求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正好位于二者之间,凭借其自身资源与地理优势,成为草原与农耕地区之间物资交换、互动的主要中介。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获得郭立新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谢忱!]

(责任编辑:沈志忠、黎海明)

^① 李延祥、韩汝琬、宝文博等:《牛河梁冶铜炉壁残片研究》,《文物》1999年12期;席光兰、李延祥:《辽宁建平县小北山冶铜遗址初步调查研究》,《有色金属(冶炼部分)》2019第5期。